

晚清改革中的語言烏托邦： 從提倡世界語到廢滅漢字

• 周質平

摘要：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中國語文被許多關心國事的有識之士認為是阻礙中國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語文改革的方案紛紛出籠。從拼音到簡化，從注音符號到統一讀音，不少人士對漢字的字形和字音改革都提出了相關的方案。其中最激進的主張是廢除漢字，以人造的「世界語」(Esperanto)來取代漢語和漢字。這一現在看來幾近荒誕的主張，在當時各種烏托邦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卻風靡一時，許多知名的學者為之奔走呼號，其背後都有無政府主義、西化、反國粹等意識形態訴求。本文對這一奇特的現象在不同時期的發展，進行審視分析。

關鍵詞：世界語 萬國新語 漢字革命 語文改革 拼音化

一 導言

語文改革是晚清知識份子的一個新關懷。漢語漢字，這個中國人幾千年來寢饋其間的交流工具，其實用性、適用性、普及性以及可學可教的程度，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成了關懷國事者的新議題。在文體上有文白之爭，在文字上有拼音簡化各種方案，在語音上則有要求「語同音」的國語運動。這些議題之所以起於晚清，當然和海通之後與外國的交流大增有關。漢語漢字和各國語文有了比較的機會，有識之士對原本習焉不察並視之為當然的語文交流工具，進行了考察與反思。其結論大致不出：漢語漢字無論在書寫、辨識、標音和語法各方面，較之拼音文字都有所不足；改革的方案，在細節上或有繁略，但基本方向都是設法將表意漢字轉向拼音。從1892年盧懋章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階》開始，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各種拼音簡字的議案多至近三十種，比較著名的如1900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1905年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譜》等^①。

在所有的語文改革方案中，最激進的是提倡以「世界語」(Esperanto) 取代漢語漢字。我曾在1997年的一篇短文中說到世界語運動對近代中國的影響^②：

在種種西化或世界化的過程中，沒有比世界語運動更能觸及中國固有文化的核心；然而，也沒有比世界語運動更「虛晃一招」，而不收任何實效。這兩句看似矛盾的論斷，實際上是互相發明的。因為語言文字是一個文化中最保守、最基本的成份，任何在語言和文字上的改變都將是最根本的改變。然而，又因為語言文字是經過長時期演變而約定俗成的一種規範和交通工具，任何變革都需要廣大老百姓長時期的參與、實踐與認同。沒有廣大群眾參與的語文運動，都不免只是學者專家在書齋中的夢囈。

近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表面上轟轟烈烈，但實際上卻從未走出過學者的書齋，對廣大老百姓的實際生活，不曾產生過任何影響。但這個激進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卻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個極有趣而且重要的議題。

二十世紀初期，「世界語」能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的注意，並有許多知名學者為之神魂顛倒，奔走呼號，其中原因之一，是“Esperanto”中譯為「萬國新語」或「世界語」(下詳)。“Esperanto”這個字，是源自波蘭人柴門霍夫(Ludwig L. Zamenhof)在1887年發表他自創的人造語時所用的筆名(Doktoro Esperanto)，原意是「期盼者」，亦即「希望」之語。他的口氣是相當謙虛的——「希望」有一天，他設計創造的這套符號能為世人所接受，成為一種溝通工具。換句話說，這只是他的「希望」，當時並未成為事實。但當“Esperanto”一詞傳入中國之後，中譯卻成了「萬國新語」或「世界語」，顯然將一個未然的期盼變成了一個已然的事實。其所引起的誤導相當於英語世界將“Esperanto”英譯為“International Language”或“Universal Language”，這在英美人士看來，不免是把個人私造的一套符號或俱樂部與沙龍裏的一種「隱語」看成了是全人類的共同語，這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柴門霍夫

「世界語」一名，由日本人首創，中譯名借用了日譯。但日本人很快就捨棄了「世界語」這一翻譯，而改用假名的音譯，我以為也是基於同樣的顧慮。至於中文的音譯，曾出現過「愛斯不難讀」，這當然近乎玩笑了，是不可能通行的。錢玄同在1918年也曾建議，捨「世界語」之名而徑用“Esperanto”之原名^③。但中國人不習慣在漢字中加入拼音文字，而“Esperanto”又是個罕見的外國字，結果，「世界語」成了“Esperanto”的中譯，沿用至今，也誤導至今。

真把Esperanto誤認為「世界語」的最典型例子是劉師培。1908年他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一文，推崇《說文解字》對漢字字義和字源的解

近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卻從未走出過學者的書齋，對廣大老百姓的實際生活不曾產生過任何影響。二十世紀初期，「世界語」能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的注意，原因之一是“Esperanto”中譯為「萬國新語」或「世界語」。

釋符合當時興起的社會學對初民社會的許多觀察和說明。他的結論是：「中土文字，古誼畢呈，用以證明社會學，則言皆有物，迥異蹈虛，此則中土學術之有益於世者也。今人不察，於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遠。不知中土文字之貴，惟在字形。」為了讓《說文》能對世界學術做出貢獻，「以顧形思義，可以窮原始社會之形，足備社會學家所擷摘，非東方所克私」，因此，他建議用 Esperanto 來翻譯《說文》^④：

今欲擴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說文一書譯以 Gesperanto (即中國人所謂世界語) 之文，其譯述之例，則皆首列篆文之形或並列古文籀文二體，切以 Cesperanto 之音，擬以 Cesperanto 相當之義，並用彼之文詳加解釋，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窮其造字之形義，以考社會之起源。此亦世界學術進步之一端也。世有抱闡發國光之志者，尚其從事於茲乎。

許多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份子視提倡「世界語」為中國現代化並進而走向世界大同的捷徑。經過百年的追逐，Esperanto 絲毫沒有成為「世界語」的任何迹象，但其附帶的作用卻造成了幾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漢語漢字的鄙視。

這是極有趣的例子，劉師培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反對漢字拼音。在上引這段話中，他真以為一旦將《說文解字》譯為 Esperanto，「世界人民」就可以援引《說文》，「以考社會之起源」。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對《說文》的推崇，另一方面表示了他對 Esperanto 的理解有誤。在他看來，這個人造語言的適用範圍和使用的人口是超過英語和法語的，並已具備了「世界語」的資格。

1908年，章太炎在〈規新世紀〉一文中也曾提出，「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為準，於他洲無所取」。因此，他建議將“Esperanto”中譯為「歐洲新語」或「外交新語」或「邦交新語」^⑤。這些譯名雖較「新世紀派」(下詳)所譯的「萬國新語」在範圍上縮小了一些，但還是過份高抬了 Esperanto 的適用性。事實上，Esperanto 從未在歐洲取得過「通用語」的地位，在外交上，也從未被視為國際間的通用語。換句話說，儘管反對世界語，章還是高估了世界語的作用和地位。

用「世界語」作為“Esperanto”的中譯，無異於將海市蜃樓看成了錦繡世界，讓許多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份子視提倡「世界語」為中國現代化並進而走向世界大同的捷徑。海市蜃樓終究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經過百年的追逐，Esperanto 絲毫沒有成為「世界語」的任何迹象，但其附帶的作用卻造成了幾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漢語漢字的鄙視，「廢滅漢字」成了1920至30年代時髦的口號，讓漢字遭受了近百年的不白之冤。即使1949年之後，在言論自由極其有限的歲月裏，批評漢字的尺度卻是無比的寬鬆。

二 《新世紀》時期

二十世紀初期，提倡世界語的主要海外刊物是在巴黎出版，由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創辦的《新世紀》，其「發刊之趣意」開宗明義地說明了辦刊的旨趣：「本報純以世界為主義，同人之意，以為苟能發願與世界種種之不平等者為抵抗，一切自包其中，不必支支節節，對於一方隅一事類而言。故雖局於情勢，

限於聞見，止用一種之文字為記載，或對一隅之事狀為糾繩，皆不得已，非敢自畫。」◎這是中國近代世界主義者的普世關懷，要為全人類謀自由平等。談中國事，對他們來說，不免是「限於一隅」，是「不得已」而為之。其胸襟之大，眼界之高，都是值得我們敬仰的；但與此並生的則是空幻的烏托邦思想。烏托邦思想一方面來自對現況極度的不滿，另一方面卻又無視於現況的苦難和局限，幻想着一朝登上「彼岸」後的極樂世界。世界語的提倡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這種心理。

1907年7月27日，在《新世紀》第6號上，有署名「醒」的一篇短文，冠題〈萬國新語〉，文章雖短，卻道出了世界語提倡者反戰並嚮往世界和平的初衷，呼應上引的「發刊之趣意」：「欲求萬國弭兵，必先使萬國新語通行各國，蓋萬國新語實求世界平和之先導也，亦即大同主義之張本也。」◎這樣的理想是偉大的，但也是空泛的；是崇高的，但也相當的虛無。世界語提倡者把一種人造的符號看成是通向世界大同的捷徑，表面上是語文改革，骨子裏是烏托邦式的無政府主義。百年之後，我們回看當時所謂的「世界語運動」，不得不說，與其說是推廣一種語言，不如說是提倡一種信念，一種對人類未來朦朧美好的憧憬◎。

為了提倡世界語，必須先誇大漢語漢字的「野蠻」和「落後」，並美化人造的世界語——不但簡單易學，而且優雅準確。吳稚暉、錢玄同、蔡元培、魯迅、傅斯年都不同程度地支持這一主張。

1908年4月25日，吳稚暉在《新世紀》第44號上發表〈新語問題之雜答〉，總結了世界語提倡者對語文改革的不同主張：「廢漢字，徑用萬國新語」。這個激進主張的理論基礎是：拼音文字比表意文字進步，而人造語言又比自然語言更精簡合理。他引篤信子的話說：「中國文字為野蠻，歐洲文字較良。萬國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為尤較良。棄吾中國野蠻之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尤較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這裏，除了「敗絮輕裘」的類比之外，並沒有任何論證。吳接着再引篤信子的話說：「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尚未有文字。萬國新語，便是中國文字。中國熱心人，願求其同類作識字人者，自己學萬國新語，教人學萬國新語。」◎這是何等武斷又妄自菲薄的議論！漢字只是「野蠻之符號」，連「文字」的資格都夠不上。

1909年6月19日，吳稚暉在《新世紀》第102號上發表〈續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總結了他對世界語和漢字的主張：「漢字者為早晚必行廢斥之一物……。上策必徑棄中國之語言文字，改習萬國新語，其次則改用現在歐洲科學精進國之文字，其次則在中國文字上附加讀音。」◎用漢字是不得已，是下下策！

當時主張用「萬國新語」來取代漢字的人都堅信，語文的優劣可以簡單地用拼音文字或表意文字來判斷。表意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是原始的也是落後的，而拼音文字則是「進化」的。「物競天擇」是「天演」不可阻擋的力量，不跟着「進化」的腳步向前走，則只有被淘汰一途。現在重讀當時的言論，不難體悟到一種深重的危機感和焦慮感。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頌德之學說〉一文，對當時進化論披靡學界的情形有扼要的敘述◎：

自達爾文種源說出世以來，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為之一變而已，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群學，宗教學，倫理道德

世界語提倡者把一種人造的符號看成是通向世界大同的捷徑，表面上是語文改革，骨子裏是烏托邦式的無政府主義。百年之後，我們回看當時所謂的「世界語運動」，與其說是推廣一種語言，不如說是提倡一種信念，一種對人類未來朦朧美好的憧憬。

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偉哉，近四十年來之天下，一進化論之天下也。……進化論實取數千年舊學之根底而摧棄之，翻新之者也。

進化論的影響在中國學界最徹底又最露骨的體現是在語文改革上，所有主張廢棄漢字的議論，都眾口一詞地指責漢字的「野蠻」和「落後」；將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生物界發現的一個現象，視為科學上的普遍真理，並運用到語文的演變上，而不察語文演變與生物進化畢竟是不同的事類。這種假「科學」之名，將語文演變強行比附在「進化」這個觀念之下的做法，是當時世界語提倡者常犯的一個錯誤，也是常用的一種策略。

1907年11月2日，第20號《新世紀》上有署名「真」(李石曾筆名)的〈進化與革命〉一文，最能體現這種「泛進化論」的精神：「進化者，前進而不止，更化而無窮之謂也。無一事一物不進者，此天演之自然，苟其不進，或進而緩者，於人則謂之病，於事則謂之弊。夫病與弊，皆人所欲革之者。」^⑬在政治制度上，他相信，由「王國」進而為「共和」，由「共和」進而為「無政府」；而在文字上，則歸為「象形」、「表意」與「合聲」三類。「象形」、「表意」文字，「循天演公例」，必進而為「合聲」。他為文字優劣所定的標準是「便利」^⑭：

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當以其便利與否，定其程度之高下，象形與表意之字，須逐字記之，無綱領可憑，故較之合聲之字，盡括於數十字母之中者為不便，由此可斷曰：象形表意之字，不若合聲之字為良。

這樣的論斷，不但過於簡單，而且有意誤導，似乎「合聲」文字，只要掌握「數十字母」，就不必「逐字記之」了。我想，只要學過一點英文的人都會同意，英文何嘗不是「逐字記之」？其困難的程度，對中國人而言，絕不下於西洋人之學習漢文。多少中國人和英文奮鬥了一輩子，聽說讀寫，依舊一竅不通，「合聲」文字，對中國人而言，究竟「便利」在何處^⑮？李石曾對漢字必須改革的結論是^⑯：

從進化淘汰之例，惟良者存，故支那文字應革命，此人人得而見之者也，知之而不肯行之，因有成見在，此成見即所謂「保國粹」也。「粹」之字意即良也，若「國粹」名果符其實，則必存，便無所用其「保」矣。若其名不符實，即不良，則必當革，不能因其為「國」而「保」也。

這段話當然是對「國粹派」的反唇相譏，表面上看似邏輯嚴整，但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借用作為為漢字辯護的理由。從甲骨文到現行的楷書，大約有三千六百年的歷史，這個「存在」的本身，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惟良者存，而劣者亡」的天演公例嗎？漢字如果真的「不良」，何以竟能「存在」三千多年？既「存在」了，就已經說明漢字是個「適者」。

當時論語文改革者，似乎分不清「拼音」(phonetic)與「字母」(alphabetic)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字母拼寫出來的文字未必就是「拼音文字」。英文就是最好的例

從甲骨文到現行的楷書，大約有三千六百年的歷史，這個「存在」的本身，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惟良者存，而劣者亡」的天演公例嗎？漢字如果真的「不良」，何以竟能「存在」三千多年？既「存在」了，就說明漢字是個「適者」。

子，許多字拼法不同，而發音無異，如“to”，“too”，“two”，如“right”，“write”。如果用英文來做類比，當時主張漢字拼音化的人則是企圖把“to”，“too”，“two”三個字都拼做[tu]，而把“right”，“write”兩個字都拼成[rait]；尤有進者，是把“philosophy”拼成[filosofi]，或把“psychology”拼成[saikologi]。這樣的改革，即使對使用字母的英文來說也是天方夜譚，更不用說施諸漢語漢字了。漢字「以形表音」的這個特點，可以解決漢語中存在眾多同音字的問題，所以，漢字實在是漢語最佳的搭檔。趙元任著名的〈施氏食獅史〉^⑩，最能說明漢字在這方面的「優」與「適」。

一旦成了一種信仰，一個膜拜的對象，科學就不再成其為科學，而成了「科學主義」，吳稚暉許多支持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的言論，都是在「科學」和「進化」的大前提之下提出來的^⑪。章太炎在〈規新世紀〉一文中也曾就這一點，與世界語提倡者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⑫。

1908年10月17日出刊的《新世紀》第69號上，有署名「蘇格蘭君」題為〈廢除漢文議〉的文章，他指出：「文字為開智第一利器，守古為支那第一病源，漢文為最大多數支那人最篤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廢除漢文。若支那於二十年內能廢除漢文，則或為全球大同人民之先進。」^⑬31日，在第71號的《新世紀》上，蘇格蘭君又發表了〈續廢漢文議〉，把為漢文辯護的「留歐美之學生」，痛詆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並用「喪心病狂」等極不堪文字加以譏貶^⑭。類似這樣情緒化的文字，實已超出了學術討論的範圍，而是進行人身攻擊了。這就更足以說明：二十世紀初

期，有關語文改革的論辯，往往只是用「語文改革」作為一個話題。各自的陣營有各自的信仰，這個信仰容或是「無政府主義」，是「西化」，是「國粹」，而「語文改革」只是為意識形態服務的一個幌子。

對《新世紀》鼓吹萬國新語提出嚴肅質疑的是章太炎。他在1908年《國粹學報》第41和42兩期發表題為〈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的長文，認為無論從音韻還是從字形上來審視，萬國新語絕無取代漢語漢字的可能。這是一篇辨析翔實，舉證確鑿的文章。章對立異鳴高的萬國新語提倡者毫不客氣地斥責道：「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

對《新世紀》鼓吹萬國新語提出嚴肅質疑的是章太炎。章是從文字和聲韻的角度來說明漢字之不當廢、不能廢，而田北湖則從民族主義和歷史的角度闡發文字在一個國家社會所起的作用，絕不只是交流的工具，而是立國的根本、國之所以為國的精神維繫。



章太炎認為萬國新語絕無取代漢語漢字的可能

而用萬國新語。蓋季世學者，好尚奇觚，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外務名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他同時指出，這套人造的符號對歐洲人或許便利，但對中國人則扞格不入。至於文盲之多寡，「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②。這幾點都切中「新世紀派」的盲點。

繼章太炎之後，田北湖在1908年《國粹學報》第47期發表〈國定文字私議〉一文，指出土地、人民、文字是「國家之建造與其成立」的三個基礎，而文字則是一國「精神維繫」之所在，因此「夫使土地猶是，人民猶是，獨至文字不然，則此土地人民謂非屬於其國，可斷言已」。章是從文字和聲韻的角度來說明漢字之不當廢、不能廢，而田則從民族主義和歷史的角度闡發文字在一個國家社會所起的作用，絕不只是交流的工具，而是立國的根本、國之所以為國的精神維繫。田不無感慨地說道：「故愛國者未有不愛其文字者也。」^③這句話若倒過來說，就成了：「不愛其文字者必非愛國者。」但用這樣的思維邏輯來論斷《新世紀》提倡萬國新語的諸君，是有欠公允的。吳稚暉是當時宣揚無政府主義和萬國新語的主將，他一生的終極關懷是中國的富強和現代化，說他不愛國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樣的例子很多，稍後的錢玄同、魯迅、傅斯年、瞿秋白都在不同時期發表過廢滅漢字的言論，難道這些人都不愛國嗎？所以田從「愛國」的立場來捍衛漢字，而責世界語提倡者為不愛國，這或不免為「以理殺人」，而這個「理」也未必站得住腳。

1908年7月25日，吳稚暉在《新世紀》第57號上，以「燃料」為筆名發表〈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回應章太炎對這一人造語的質疑。他的策略是盡量把文字說成只是溝通的工具，與歷史、文化、民族感情無關。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道：「語言文字之為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語言文字，止為道理之筌蹄，象數之符號乎。」^④既然語言文字只是一種工具，那麼工具的優劣，端視其「可相互」範圍之廣狹而定，廣者優，而狹者劣。吳對章為漢語漢字的辯護則譏之為^⑤：

欲取已陳之芻狗，將中國古世椎輪大輅，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蠻無統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謂「無當玉卮」。陳之於博物院，則可觸動臭肉麻之雅趣，若用之大飯莊，定與葱根菜葉，共投於垃圾之桶。

這段幾近謾罵的文字，與其說是譏諷章太炎，不如說是對漢語漢字的醜詆。讓人最可驚異的是，當時這批學養豐富，提倡萬國新語的新派人物，似乎完全忘了語文發展的終極原則是「約定俗成」的古訓。一個有幾億人口、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所使用的語言和文字，豈是一個人造的語言所能取代的？這樣的常識，現在一般人都能理解，何以百年之前的碩學俊彥卻蒙昧如此？至於所謂「可相互」，漢字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可相互」的唯一工具，這個在吳看來應該丟到垃圾桶裏的漢字，為地廣人稠、方言處處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凝聚民族意識的最佳基礎，並創造出了燦爛的文明和文學。當時人們往往將文盲的多寡，歸罪於漢字的難寫，難識，難學。其實使用者的多寡和工具的難易，並沒有絕對

當時這批學養豐富，提倡萬國新語的新派人物，似乎完全忘了語文發展的終極原則是「約定俗成」的古訓。一個有幾億人口、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所使用的語言和文字，豈是一個人造的語言所能取代的？漢字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可相互」的唯一工具。

的關係。更何況漢字是否一定比拼音文字難學，始終沒有科學的定論。中國人至今仍用漢字，而文盲率則大大降低，這還不足以說明：文盲之多，罪不在漢字，而是在經濟不發達、教育不普及嗎？

在吳稚暉發表了〈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章太炎在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報》第24號上對《新世紀》提出了總批評，其重點則集中在無政府主義與萬國新語。他說：「無政府主義本與科學異流，亦與哲學異流，不容假借其名以自尊寵。」^{②⑥}換言之，無政府主義既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只是西方「功利學派之偏見」^{②⑦}。至於以萬國新語取代漢語漢文，他的指責就更嚴厲了：「欲絕其文字，杜其語言，令歷史不燔燒而自斷滅，斯民無感懷邦族之心。」^{②⑧}這樣的提法是為了說明，語言文字絕不只是「人與人相互」的工具，而是一個國家歷史文化的載體，是具有「國性」的，是「約定俗成」的，是不容許隨意替換的。以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家，捨棄固有的語言文字以從他國，這無異於「以冠帶之民，撥棄雅素，舉文史學術之章章者，悉委而從他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彼自貴以無政府主義者，不恩民族，不賴國家，興替存亡無所問，效雉鳴以求新牡，其無所顧惜也則宜」^{②⑨}。

章太炎把語言文字視為國家民族之命脈，是一個民族認同最終的歸宿，這都是極有見地的。唯其如此，任何語言文字的改變絕不是少數幾個人寫寫文章，發發議論就能奏效的。換句話說，章未免把吳稚暉等人一時的議論太認真對待了。漢語漢字，幾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文化上根深葉茂、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豈是《新世紀》上的幾篇文章所能撼動得了的？至於指控提倡世界語的人自願做文化上的亡國奴，這卻是嚴重的誣告。

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主張萬國新語或漢字拼音化的新派人物，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往往透過最極端的國際主義形式表達出來。廢滅漢字，提倡世界語或拉丁化，正是這一矛盾現象的顯例。主張語文改革者，一方面是極端地反傳統，另一方面卻又極端地愛中國。

主張和反對萬國新語的兩派意見，在表面上南轅北轍，但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中國的富強、中國的現代化，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毫無二致的，所不同的只是手段而已。就提倡世界語而言，吳稚暉是以世界主義的手段來達到民族主義的目的。一個主張「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③⑩}的人，怎麼可能願意在文化上作亡國奴呢？

1950年，美國學者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在著作中把由語文改革所引起的政治議題視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③⑪}。這個提法受到胡適嚴厲的批評，說德范克是個「對政治有偏見，對歷史，尤其是文學史，一無所知的人」。胡適說，在近代中國語文改革史上，有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中國所有的語文改革，無論是白話文運動也好，提倡拼音也好，毫無疑問的都是由國際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來領導，並一致受到民族主義者(包括國民黨)的反對。」^{③⑫}但胡適的這個說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稍後的錢玄同、傅斯年都是主張廢滅漢字的。就語文問題而言，他們似乎較偏向於國際主義，但一旦遇上民族存亡的問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凜然大義則立足於民族主義。其實，胡適本

許多主張萬國新語或漢字拼音化的新派人物，其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往往透過最極端的國際主義形式表達出來。廢滅漢字，提倡世界語或拉丁化，正是這一矛盾現象的顯例。主張語文改革者，一方面是極端地反傳統，另一方面卻又極端地愛中國。

人又何嘗不是如此：表面上，他是一個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者，但他的終極關懷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富強與現代化。改良派和國粹派，所不同的往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所謂殊途同歸。

三 《新青年》時期及其餘波

繼《新世紀》和《國粹學報》討論萬國新語之後，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也提出了世界語的問題。積極主張提倡世界語的是錢玄同和陳獨秀，其中尤以錢的看法最為激進。錢雖是章太炎的學生，但在世界語的問題上，卻完全接受了吳稚暉等世界語倡者「廢除漢字，徑用世界語」的主張。他在語文改革上的許多意見，而今看來，不免是激進有餘而思考不足，對世界語文的發展也有許多一廂情願的看法。他覺得一個人造語言比自然演進出來的語言，適用的範圍更廣，更容易學習，這都是有悖常理的。

錢玄同較吳稚暉更為激進的表現是：視「孔學」與「漢字」為一體，兩者是「狼狽為奸」的「共犯」，必須同時鏟除。在他給陳獨秀的一則通信中談到「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其中痛切地指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³³吳的立論較偏向於漢字的本身，而錢則認為漢字所承載的內容亦在必去之列。他指控中國思想之所以「野蠻落後」與漢字有千絲萬縷分不清的關係：「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³⁴，似乎「發昏做夢」全因漢字而來；其實，漢字固然可以寫「發昏做夢」的話，也可以表達頭腦清醒的思想，「發昏」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

錢玄同為漢字的命運作了最後的宣判³⁵：

所以我要爽爽快說幾句話：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

在錢的筆下，中國文字不但「一無是處」，簡直「惡貫滿盈」。為了拯救中國，他的處方是：「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³⁶這段話實為魯迅1936年所說的「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張本³⁷。在這樣粗糙的論證基礎上，錢提出了用世界語取代漢語漢字的主張³⁸：

國語既不足以記載新文明，改用某種外國語文又非盡善盡美的辦法，則除了提倡改用Esperanto，實無別法。況Esperanto是改良的歐洲文字；世界上既有這樣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製造這種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國人誠

錢玄同較吳稚暉更為激進的表現是：視「孔學」與「漢字」為一體，兩者是「狼狽為奸」的「共犯」，必須同時鏟除。吳的立論較偏向於漢字的本身，而錢則認為漢字所承載的內容亦在必去之列。他指控中國思想之所以「野蠻落後」與漢字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能棄其野蠻不適用的舊文字而用之，正如脫去極累墜的峨冠博帶古裝，而穿極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裝也。

從這段話裏，很容易看出吳稚暉的影響。

陳獨秀對錢玄同的這番主張是贊成的，但在過渡時期，他建議：「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③對這一點，胡適是同意的。但他同時指出，凡事得有個先後順序，雖然他也認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當務之急是提倡白話文，拉近語文的距離，減少文言中的單音字，為將來的拼音做好準備工作，世界語、拉丁化都暫且不談^④。白話文運動的成功，證明了胡適主張的正確。至於「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這點，卻是未經「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胡適的這句話是1918年說的，將近一百年了，眼下我們還看不到漢字有任何轉向拼音的跡象。

錢玄同主張用世界語來取代漢語漢字，是基於「一步到位」和「畢其功於一役」的心理。他認為與其用英語來取代漢語，不如用世界語，因為英語「究竟是歷史上遺傳下來的文字，不是用人工改良的文字，所以龐雜的發音，可笑的文法，野蠻幼稚的習慣語，尚頗不少」^⑤。這完全是以個人的意志來論斷語文的發展，在錢看來英語中種種「可笑」、「野蠻」的現象，無一不是其來有自；在以英語為母語的人眼中，非但「不可笑」、「不野蠻」，而且極為必要，缺一不可。

如果人造語真勝自然語，那麼，當年在統一國語語音時，何不取各地方言中在語言學家看來最「簡易」、「合理」的子音母音拼合成一「國語」？1921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有規定五聲標準的議案，企圖將入聲保留在國語中，胡適在〈高元國音學序〉中斬釘截鐵地說道這斷無可能：「北部與西部的廢止入聲，是語言自然演化的結果，決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使已經天然淘汰了的入聲依舊回到國語裏去，這個入聲的復辟比滿清帝室的復辟還要艱難一千倍。」^⑥國語最終決定以「京音」為準，而放棄「國音」是人造語行不通最好的說明。連幾個子音母音、一個入聲，都容不得「南北兼顧」，更不要說用個人私造的符號來取代有數千年歷史、幾億人使用的漢語漢字了。

對錢玄同好走極端的個性，魯迅有過生動的評論：「一般人說話，十分話，只須說到八分；而錢玄同卻一定要說到十二分。」^⑦錢在談語文改革時，充分地展現了這種立異鳴高的作風。廢滅漢字這樣過激的主張，一方面固然與提倡者的個性有關，另一方面卻也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緊迫與焦慮，急於為中國這個老病的文化探病處方，以至於病急亂投醫，而未進一步考察是否對症下藥。

1927年，魯迅在香港演講〈無聲的中國〉，認為白話文之所以能在短時期之內風行，是因為錢玄同提倡廢滅漢字，起了轉移目標的作用。中國人喜歡調和，錢的過激主張，轉移了反對白話者的注意，而將攻擊的矛頭轉向了廢滅漢字，「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⑧雖然這段話不無譏諷，但對錢廢滅漢字的主張，還是給出了一個別有見地的正面評價。

當時在為世界語搖旗吶喊，一片叫好的形勢下，陶履恭是持反對意見的。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號刊出陶履恭給陳獨秀的信，陶從理論語言

陶履恭指出：「世界語」和「世界主義」是兩回事，並不是有了「世界語」就可以保證「世界主義」的實現。這番話對當時沉醉在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中的仁人志士可以說是當頭棒喝。將 Esperanto 真當作「世界語」來推行，這本身就是蒙昧落後最好的說明。

學、民族心理及世界語之功用三方面來審視，認定：「世界語既無永久之歷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歐洲大國之單語，律以人造之文法，謂可以保存思想傳達思想乎？」章太炎從中國語言的聲韻、文字、詞彙的角度來論證世界語之必不能取代漢語漢文；而陶則從更廣闊的角度來說明，所謂「世界語」無非只是一個「半生半死之人造語」。他同時指出：「世界語」和「世界主義」是兩回事，並不是有了「世界語」就可以保證「世界主義」的實現^④。這番話對當時沉醉在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中的仁人志士可以說是當頭棒喝。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往後中國世界語的研究中，反對的意見往往受到忽略。

1918年4月15日，陶履恭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上率直指出^⑤：

世界語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吾輩今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想後於歐美之一種表象。……吾之位置：是絕對的不信世界語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語與世界統一有因果之關係。不信世界語為人類之語言。謂余不信，請再俟五十年視世界語之運命果為何如？

胡適把「世界語」和“Esperanto”分開來看，是極有見地的。世界上應不應該有一個國際通用語，是一個問題；至於這個通用語是不是Esperanto，又是另一個問題。當時支持世界語的人大多覺得世界上應該有一個共同語言，同時認定Esperanto就是「世界語」。

百年之後，重讀這段話，不得不佩服陶履恭的膽識與眼光。就如他所說，將Esperanto真當作「世界語」來推行，這本身就是蒙昧落後最好的說明。現在重看《新青年》上有關提倡世界語的文字，不免覺得許多言論都只是一時意見，既沒有科學的驗證，也沒有嚴肅的研究，只有煽動性，而缺乏說服力。

在《新青年》這次為世界語展開的辯論中，胡適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他沒有明白表示過支持，也沒有公開反對過世界語。在1918年8月7日所寫的一則短短的通信中他表白說：「我對於『世界語』和Esperanto兩個問題，始終守中立的態度」，並請求正反雙方，「討論終止」。胡提出「停戰」，多少覺得這種討論有些無謂，錢玄同把胡的「討論終止」，理解為反對Esperanto。他說：「適之先生對於Esperanto，也是不甚贊成的，（此非億必之言，適之先生自己曾經向我說過），所以不願大家爭辯此事。」^⑥換句話說，胡沒有直接批評提倡Esperanto，只是不願以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身份，公開反對一個帶有象徵意義的新事物。

胡適把「世界語」和“Esperanto”分開來看，是極有見地的。世界上應不應該有一個國際通用語，是一個問題；至於這個通用語是不是Esperanto，又是另一個問題。當時支持世界語的人大多把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了，他們不但覺得世界上應該有一個共同語言，同時認定Esperanto就是「世界語」。

胡適對語文改革的態度也是比較謹慎持重的。他一方面覺得漢字應該改革，但另一方面又多次說明：「我是有歷史癖的；我深信語言是一種極守舊的東西，語言文字的改革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⑦他甚至認為文字「比宗教還更守舊，還更難改革」^⑧。因此他「對於用拼音文字替代漢字的運動，雖然誠心的贊成，總沒有熱烈的提倡」^⑨。在胡看來，連漢字拼音化都言之過早，遙不可及，那就更不必說用Esperanto來取代漢語漢字了。

胡適對語文改革的主張，其基本原則始終是1918年提出來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⑩。1936年6月28日，他和周作人在《獨立評論》第207號上，有「國語

與漢字」的討論，周的看法和胡很接近：「語言用非方言的一種較普通的白話，文字用雖似稍難而習慣的漢字，文章則是用漢字寫白話的白話文：總括一句，即是國語，漢字，國語文這三樣東西。用方言，用拼音字，均不能通行，注音符號可以加在漢字旁邊，或註中記音，很有用處，卻亦不宜單用。」⁶⁰胡對周的這一提法，也深表同意⁶¹：

在這個我們的國家疆土被分割侵佔的時候，我十分贊成你的主張，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語，漢字，國語文這三樣東西」來做聯絡整個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這三件其實只是「用漢字寫國語的國語文」一件東西。這確是今日聯絡全國南北東西和海內海外的中國民族的惟一工具。

從晚清到1930年代，漢語漢字受了近半世紀的誣衊摧殘之後，各種拼音方案、世界語、拉丁化，都未動得它分毫。到頭來，還是回到了「卑之，無甚高論」的用漢字寫國語的白話文。經過幾番滄桑之後，知識份子從幻境又回到了現實，回過頭來再度審視被批評指責得一無是處的漢語漢字，發現它還是我們唯一賴以維繫和交流的工具。

1936年，王力就為漢字說了幾句公道話⁶²：

漢字有數千年的歷史，而始終沒有走到拼音的途徑，這雖可以有其他的原因，但我們該承認漢字自身實有充分表達思想的能力。文言文不能表達現代的思想，這是語言的關係，與文字無關；中國文字往往不適宜於翻譯外國文字，這更與漢字的價值無關，因為外國文字也往往不適宜於翻譯中國文字，我們並不因此而說外國文字的價值較低。

這是一段心平氣和的話，很可以供給提倡世界語、廢滅漢字的人冷靜的思考。

李金髮是一個留學法國多年、嫻熟西文的現代詩人，他對擾攘了幾十年的語文改革，也給出了令人深思的觀察⁶³：

西洋文字也不是易學的，恐怕比我們的白話文要難幾倍。為甚麼他們不天天鬧着要廢除本國文字，改用甚麼別的新文字呢？……中國人文盲多，根本是沒有機會讀書，原因是救餓無暇，並不是因為文字難……中國領土廣大，種族又繁，方言不下數千種，所幸還能到處通行，人人認得的（雖發音不同）是一統一的文字，這是何等偉大的現象……

李金髮雖不是語文專家，但他有多年外文的訓練及翻譯的經驗，他在這篇文章中同時比較中西語法的異同，認為與英、法、德這三個語言比較，中文語法是相當簡易而又合理的。

在近代中國語文改革的歷史上，知識份子近百年的尋尋覓覓，總想藉「西法」來改造漢語漢字，到頭來，發現「新人不如故」，「至寶原在家中」，還只有祖宗流傳下來的漢語漢字，是溝通南北東西唯一的工具。

從晚清到1930年代，漢語漢字受了近半世紀的誣衊摧殘之後，各種拼音方案、世界語、拉丁化，都未動得它分毫。到頭來，還是回到了用漢字寫國語的白話文。知識份子回過頭來再度審視被批評指責得一無是處的漢語漢字，發現它還是我們唯一賴以維繫和交流的工具。

四 1949年以後中國的世界語

1979年8月，胡愈之在第二次全國世界語工作座談會上，有如下一段講話，最可以看出1949年之後，世界語在中國的發展表面上蓬勃興旺，但實際上卻是打了「激素」之後的「虛假繁榮」，也是世界語日暮途窮最好的說明^⑥：

中國的世界語運動搞了五六十年，沒有很大發展，中間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對世界語非常重視，沒有黨的領導，世界語在中國不可能發展。新中國建立後，黨和政府重視世界語，毛主席、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都支持世界語。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世界語〔提倡〕者，但黨和政府這樣重視世界語的，恐怕只有中國。

胡愈之也許忘了，1922年他在《東方雜誌》發表的〈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一文中曾明白宣稱：「世界語的傳播，照原始家柴門霍夫的初志，是主張絕不依賴各國政府的勢力的。所以國際語運動，可以說，完全是國際民眾的運動。」^⑦回看世界語在中國的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胡愈之、葉籟士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語聯），這個組織已成了左翼文化總同盟領導下的一個團體，就如世界語運動研究者侯志平所說：「把世界語運動同中國革命和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⑧

1933年，語聯的公開活動組織——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發行機關報《世界》，明定「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為「綱領性的口號」^⑨。至此，世界語在中國的發展已喪失了它的中立性，成了中國共產黨旗下的一個宣傳工具。也正因為這樣的轉變，1949年之後，在中國幾乎看不到對世界語任何批評的文字。這樣政治化的過程是背離柴門霍夫「初志」的。國內世界語提倡者往往看不到這一點，反而津津樂道世界語者被共產黨「收編」的過程。就如社會語言學家、曾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會長的陳原在1998年所說：「當人們企圖考察近代中國的語文運動（包括世界語運動），而完全漠視它跟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結合的特點，那絕對說不到點子上。」^⑩陳所謂的「點子」是世界語在中國的推行，曾經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作出過貢獻。但實際上是，這個「貢獻」使Esperanto從一個中性的語文工具變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工具。這不但無助於它成為國際的通用語言，反而為原本中立的人造語言加上了特定的政治色彩，這對世界語在中國的發展是不利的，也是不幸的。因為原本對世界語有興趣的人，察覺到它和「民族解放」運動如此「緊密結合」的時候，大多為之卻步。

陳原1999年為《世界語在中國一百年》一書寫的代序中就清楚說明：「全國解放後的50年間，世界語運動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關注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而他之所以對世界語保持着感情，是「因為它〔世界語〕曾經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⑪。換句話說，1949年之後，世界語在中國的發展完全是在共產黨的扶持下來進行的，完全背離了柴門霍夫「絕不依賴各國政府的勢力」的原則，將這樣的轉變稱之為「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是世界語在中國墮落的最好證明。

1930年代的世界語運動，往往強調其「普羅」性，如語聯的機關刊物名為《中國普羅世界語者》^⑫。給人的錯覺是中國的普羅大眾（無產階級）都對這個來自

1949年之後，在中國幾乎看不到對世界語任何批評的文字。這樣政治化的過程是背離柴門霍夫「初志」的。Esperanto從一個中性的語文工具變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工具，不但無助於它成為國際的通用語言，反而為原本中立的人造語言加上了特定的政治色彩。

歐洲的人造語言趨之若鶩。其實，在中國，世界語運動自始至終和所謂普羅大眾不曾有過半點關係。從二十世紀早期的留法學生如吳稚暉等人在《新世紀》上撰文提倡「萬國新語」，到五四前後《新青年》雜誌上熱烈討論「世界語」的學者，如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魯迅、陶履恭等，不是北大教授就是留洋學生，直到1930至40年代積極提倡世界語的胡愈之、陳原、葉籟士等，可有一人屬於「普羅」？

1930至40年代的中國勞動人民（即普羅大眾）是魯迅筆下的阿Q，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是鄉音不改的老鄉。對這樣的普羅大眾來說，連漢字、普通話都遙不可及，甚麼Esperanto、「愛斯不難讀」、萬國新語、世界語，無論用哪個稱謂，對他們來說都是「海外奇談」，有如天書。把「世界語」加上「普羅」兩字，是世界語在中國傳播受到政治污染最好的證明。

胡愈之從1914年起，即十八歲就開始學世界語，到了八十三歲，回首看自己一輩子獻身的事業，他不得不承認：五六十年來並沒有很大的發展，而這點發展還是仰仗了黨和政府的支持。這點重視和支持或許能讓世界語提倡者在中國開個座談會，組織幾個函授班，出兩份刊物，但真要讓世界語成為胡所說的「國際普通話」^③，那無異是痴人說夢了。從夢境中醒過來，不但需要清醒的頭腦，還需要忍受相當的難堪和冷落，這往往不是世界語提倡者所能承受的。到了1979年，胡愈之還喃喃自語地引毛澤東的話說，「毛主席曾說過，將來實現了共產主義，各國之間來往更密切了，甚至國家都沒有了，那時的問題就是講話困難……但是總會有一天，到了共產主義或者世界實現和平時期，那時世界語就會有一個大發展。」^④胡在講話中勉勵與會的同志「我們要向前看，看到將來。」^⑤這樣的「將來」，真是有如「天堂」一般的遙遠了。

胡愈之的這番話是他1922年發表的〈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一文中「理想」部分的引申：「國際語決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是一種偉大的改造理想。」這一「理想」「必須建築在非國家主義的基礎之上」^⑥。世界語提倡者往往分不清理想、幻想與夢想的不同。世界大同，全人類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這樣的理想和信念當然是崇高偉大的，無奈這種烏托邦式的思想只是桃花源中的產物，與現實世界無關。陳原在1998年還相信世界上能有一種「非先天的（即人工制定的）、超民族的、中立的、又富有彈性能表達各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國際輔助語」^⑦！人間豈有一種語言，天然的或人工的，是「超民族的」，「中立的」？就以Esperanto而言，這是一種似英、似法、似德，而又非英、非法、非德的人造符號，對歐美人來說也許還有一定的「似曾相識」，畢竟使用的還是羅馬字母，但對從小說漢語寫漢字的中國人而言，這可是不折不扣的外語。

即使連陳原也不得不承認，世界語只是一個夢。他說：「世界語是一種語言（沒有死！），但不僅是一種語言，它是一個夢（不過那不是甚麼殘夢惡夢幻夢），是一個美好的夢，是善良的人的夢，是理想者的夢。」^⑧世界語之夢可以歸為兩類：

其一是對人類共同語的憧憬，認為世界各國人民都會採用一種人為的輔助語，這是語言上的烏托邦，這一思想和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一拍即合，把世界語看成達到世界大同的捷徑。全世界人民可以用這一人造語言交流溝通，其樂融

對普羅大眾來說，連漢字、普通話都遙不可及，甚麼Esperanto、「愛斯不難讀」、萬國新語、世界語，無論用哪個稱謂，對他們來說都是「海外奇談」。把「世界語」加上「普羅」兩字，是世界語在中國傳播受到政治污染最好的證明。

世界語提倡者總忍不住要把「民族解放」、「全人類解放」這類空話、假話掛在筆端口頭，使世界語這個原本只是語言的問題走上了政治的歧路。二十世紀初期，提倡世界語最主要、最動聽的理由就是要讓中國和世界交流接軌。而今看來，不是世界語救中國，而是中國救世界語了。

融，這樣的企盼是美好的，但內容卻是空洞的甚至是荒誕的。然而，這樣荒誕空洞的語言烏托邦思想卻成了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時髦和追求。

其二則是寄望世界語對中文進行改造，甚至以世界語取代漢語漢文。這一提法完全背離了「約定俗成」為語文發展的通則，並無視於漢語有億萬人使用、漢字有數千年歷史的事實。這樣的激進思想雖無助於世界語在中國的推廣，更不要說在全球的使用，但由於長期對漢語漢字的詆毀，造成了中國人對自己語文輕蔑的態度，養成一種根深蒂固崇洋媚外的心理。

世界語提倡者總忍不住要把「民族解放」、「全人類解放」這類誇大不實的空話、假話掛在筆端口頭，使世界語這個原本只是語言的問題走上了政治的歧路。二十世紀初期，提倡世界語最主要、最動聽的理由就是要讓中國和世界交流接軌。說得更直白一些，是要讓世界語來救中國，而今看來，不是世界語救中國，而是中國救世界語了。

註釋

- ① 參見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頁3-12。
- ② 周質平：〈春夢了無痕——近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讀書》，1997年4月號，頁108-109。
- ③④ 孫國璋：〈通信——論Esperanto（附錢玄同，陶履恭答書及胡適跋語）〉，《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頁363；364-65。
- ④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國粹學報》，第46期（1908），頁2。在原文中，將“Esperanto”誤拼為“Gsperanto”和“Csperanto”。
- ⑤⑬⑭⑮⑯⑰ 章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1908年10月10日，頁11；1-27；6；7；10；20。
- ⑥ 〈新世紀發刊之趣意〉，《新世紀》，第1號，1907年6月22日，頁1。
- ⑦ 醒：〈萬國新語〉，《新世紀》，第6號，1907年7月27日，頁3。
- ⑧ 參見Ulrich Lins, “Esperanto as Language and Idea in China and Japan”,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32, no. 1 (2008): 47-48。
- ⑨⑩ 吳稚暉：〈新語問題之雜答〉，載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卷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頁3；3-4。
- ⑪ 吳稚暉：〈續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新世紀》，第102號，1909年6月19日，頁10。
- ⑫ 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79。
- ⑬⑭⑯ 真（李石曾）：〈進化與革命〉，《新世紀》，第20號，1907年11月2日，頁1。
- ⑮ 有關漢語漢字和歐西語文難易的比較，參見金髮：〈我懷疑漢字的改革方法〉，《獨立評論》，第217號，1936年9月6日，頁11-14。
- ⑰ 參見趙元任：〈語言跟文字〉，載《語言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149。
- ⑱ 有關吳稚暉的「科學主義」，參見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33-58。
- ⑳ 蘇格蘭君：〈廢除漢文議〉，《新世紀》，第69號，1908年10月17日，頁11。
- ㉑ 蘇格蘭君：〈續廢漢文議〉，《新世紀》，第71號，1908年10月31日，頁12。
- ㉒ 章絳（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國粹學報》，第41期（1908），頁6。另參見《國粹學報》，第42期（1908），頁1-9。此文同時發表在《民報》，第21號，

1908年6月10日，頁1-24。有關章太炎這一時期對語言文字問題的論爭，參見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漢字統一」與「萬國新語」——章太炎關於語言文字問題的論爭（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頁65-82。

⑳ 田北湖：〈國定文字私議〉，《國粹學報》，第47期（1908），頁1-2。

㉑㉒ 燃料（吳稚暉）：〈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新世紀》，第57號，1908年7月25日，頁11；13。

㉓ 吳稚暉：〈箴洋八股之理學〉，載《科學與人生觀》，第二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頁9。

㉔ John De Franci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viii.

㉕ Hu Shih,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by John De Franc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 no. 4 (1951): 899.

㉖㉗㉘㉙㉚ 錢玄同：〈通信——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附陳獨秀答書及胡適跋語）〉，《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頁350；351；354；354；356；356-57。

㉛ 魯迅：〈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引自倪海曙編：《中國語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上海：時代出版社，1949），頁119。這篇訪問稿《魯迅全集》未收。

㉜㉝ 區聲白：〈通信——論Esperanto（陶履恭答，附錢玄同陳獨秀跋語）〉，《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頁183-84；183。

㉞ 胡適：〈高元國音學序〉，載《胡適文存》，第二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8），頁477。

㉟ 參見黎錦熙編著：《錢玄同先生傳與手札合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36。

㊱ 魯迅：〈無聲的中國〉，載《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13。

㊲ 陶履恭：〈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頁1-2。

㊳ 孫國璋：〈通信——論Esperanto（陳獨秀答，附胡適錢玄同跋語）〉，《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頁185-86。

㊴ 胡適：〈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卷頭言〉，載《胡適文存》，第二集，頁539。幾乎雷同的話在1936年6月21日給周作人的信中又說了一次。參見周作人、胡適：〈國語與漢字（討論）〉，《獨立評論》，第207號，1936年6月28日，頁5。

㊵㊶㊷㊸ 周作人、胡適：〈國語與漢字（討論）〉，頁5；6；5；6。

㊹ 參見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胡適文存》，第一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8），頁55-73。

㊺ 了一（王力）：〈漢字 改革的理論與實際〉，《獨立評論》，第205號，1936年6月14日，頁6。

㊻ 金髮：〈我懷疑漢字的改革方法〉，頁13。

㊼㊽㊾ 胡愈之：〈在第二次全國世界語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胡愈之文集》，第六卷（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104；105；105；104-105。

㊿ 胡愈之：〈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載《胡愈之文集》，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276；271。

㉀㉁ 侯志平編：《世界語運動在中國》（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85），頁5；5-6；5。

㉂㉃ 章怡（陳原）：〈語言的困擾與理想的追求〉，《讀書》，1998年9月號，頁116；110；116。

㉄ 陳原：〈關於世界語在中國傳播的隨想——《世界語在中國一百年》代序〉，載侯志平主編：《世界語在中國一百年》（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9），頁4、5。